

■大学之道

当校长是一项历史使命

■新竹清华大学校长 陈力俊

孙中山先生说过,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自上任以来,我更能体会到梅贻琦老校长的心愿——一生为一念,把清华办好。基于新竹清华大学在中国和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作为新竹清华校长,我想更要着眼于做大事。

民主治校是清华的传统

梅贻琦的教育理念是一个普世价值。他的第一个理念是要办好大学,就要有好的师资。如果没有一流的师资,优秀的生源、经费就无从谈起。这也是我们最重视的理念。

此外,把基础做扎实很重要。梅贻琦的办学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昆明、台湾,规模都不大,可是名师云集,这也成为他办学成功的重要策略。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曾说,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是扩张,难的是维持现有的规模和质量。该校始终遵循“学科不求过多,范围不求过宽,严格保证学生入学和学习质量”的办学方针。梅贻琦也是如此,在抗战时期领导的西南联大,可谓中国史上最强的高校,当时的教授不足200个人,学生不超过2000人,规模虽然不大,但有很多大师,培养出大量高水平的学生。

现在世界上的大学一般为教师治理,即教授治校,教师对学校有共同的责任,比如课程和聘人等都以学术的专业要求来治理。但是,学校建设属于专业管理,这是校长和团队的工作。我们也曾将两者混在一起,但如今已经分开了,观念较为正确。民主治校是清华的传统,通过评议会、教授会制度,将校务工作民主化,才能让更多的教师参与校务,承担责任。当年梅贻琦着力推行民主治校作风,一方面是他的个性使然,他是清华的领头人,要带领大家一起承担爱护清华和发展清华的责任;另一方面,学校外部的压力很大,推行民主治校也是让政治影响较小的一种方式。正是梅贻琦

让这一校务管理基础更坚实。

把百分制改为等级制

新竹清华在很多领域都是领头羊和开创者,其实这也是清华的传统。在校务方面,新竹清华有很多独创之处——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中一项创新成果是把成绩百分制改成A、B、C的等级制。

由于台湾和大陆都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使得学生们往往对考试分数斤斤计较。而一个人的养成,不光靠的是专业,还必须有人文素养和社会服务意识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学生抽出时间去培养。能够考进新竹清华的学生,本身是非常优秀的。如果一定要去争第一名、第二名,学生必然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其实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实际上,考第一名的学生,真正成就高的人非常少。这一事实告诫我们,一个人要有成就,光靠专业并不够。既然光靠专业不够,为什么不在其他方面多充实自己,让未来前程变得更加光明?这也是学分制改为等级制的重要逻辑。

担任校长的第一学期,我就在积极推进这项改革,此前学分制已在新竹清华实施了50多年。如今,台湾大学也采用等级制,他们讨论了很久,直到新竹清华大学考评等级制通过以后,他们才跟进。现在也有一些学校在慢慢跟进。事实上,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很多优秀的高校都在实行等级制,实行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我们自己。全世界目前只有大陆和台湾实行百分制。

我相信,新竹清华的这项改善,5年、10年就可以看见成效。用等级制考评,前30%是A,表示学生课程有一定的收获,这样就够了。如果为了多考一两分,学生可能要多花一倍的时间,这就像始终在一个小游泳池里重复游泳,做无谓的练习。每个学生在大学期间要学习许多课程,最终平均下

来,还是能够分出学生学习的优劣。

迈向世界顶尖大学的路要稳

现在大陆一些大学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作目标,新竹清华也有迈向世界顶尖大学的计划,有了目标,我们就应该脚踏实地地地去实现。

不得不注意的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较迟,最早的京师大学堂也不过比清华早十几年,发展现代意义的大学的时间更短,中间还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政府没有精力来发展高等教育。严格来说,两岸的大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算进入世界舞台。

大陆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刚刚恢复,台湾是领先大陆的,90年代台湾相对领先,但大陆已经有些起色了。2000年后,大陆教育因为总量庞大,发展迅速,大陆和台湾教育发展不相上下,但在数量上还是大陆居多。

在这种背景下,大陆高校、台湾高校要打造成为世界名校,时间上还不够。因为文史哲发展受政治影响比较大,理工科和生命科学要靠经费、设备。其实,大家可以乐观一些,毕竟二者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更加希望,二者在迈向世界顶尖大学的路能够走得稳定一些、长久一些。

如今大陆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要把握这一契机,实现两岸合作,共创双赢。由于大陆高校、台湾高校发展的轨迹不一样,互有长短,互相学习是很重要的。目前,两岸四地的大学校长已经有定期聚会交流,我们在北京清华举办了新竹清华日活动,我带领新竹清华12位名师赴北京清华交流,每位教授都作了精彩的讲座。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年还会继续开展,并且范围还将有所扩大。

(通讯员钟秀斌、颜小革采访整理,有删节)

笔者曾看过一篇题为《87.9%的人坦言当前大学生追捧“酱油课”》的调查报告,在百度词条中“酱油课”是指高校中那些上课时不常点名,考试容易过,学分好到手的课程。对于“酱油课”的出现,舆论纷纷指向当今高校教师热衷科研,轻视教学,批评在校大学生功利心过重,趋乐避苦。从问题的表面看,没有打酱油的教师就不会有打酱油的学生,没有学生的功利心,就不会有“酱油课”的流行。然而从更深层次来思考,不禁要问,为什么影视欣赏、娱乐休闲、技能训练这些学术价值不高的课程会进入象牙塔,为什么严谨的大学课程却要用光怪陆离的名称吸引“眼球”?从本质上说是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理解课程。

油课”恐难称其为课程。

课程设计其实是一种价值的选择,即以学科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为中心。从课程体系到每一门课程设计都不可能是单一的选择,往往是多元选择的结果。在我国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中,课程设计更多从知识的逻辑体系出发,从社会、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出发。而高等教育改革的总体方向,则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学生个体的需求与发展。目前我国高校的课程体系基本由两部分组成,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的设置以学科和社会为中心,选修课的设置则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和学生个性化需求。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

“酱油课”孰之过

■高蓓蕾

什么是课程?引用美国著名课程理论家辛尔达·塔巴的观点:“所有的课程,不管是什么样的特殊设计,都是由一定的元素组成的,课程通常包括对目的和特定目标的阐述;对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它或者是暗含着或者是显示一定的学和教的类型,不管是因为目标的需要还是内容组织的需要;最后还包括对结果的评估方案。”因此,课程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精心组织的教学内容、匹配的教学模式、对教学效果以及目标达成情况的考核评估。不把课程与讲座作个比较,以理解课程的内涵。两者都是信息传播,讲座仅仅满足受众的精神、生活或知识的需要,受众无需付出努力;而课程在满足学生需要的同时,必须引发学生的学习,自主建构知识,实现发展。一个讲座可以是相对独立的内容,而一门课程一定是系统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学生能力素质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所以讲座无需考核效果,而课程必须有严格的考核过程,以检测教师信息传递是否达成了教学目标,学生是否掌握了知识与技能。显然,从课程的四个要素出发,“酱

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之后,各高校虽设置了灵活多样的选修课,选修课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但受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影响,选修课一直处于打酱油的地位,从课程质量与管理要求上没有实现与必修课的同质化。边缘化的状态,疏于管理与建设,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酱油课”会大行其道。

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同样是课程,其基本要素和所要实现的教学目标是一致的,仅对学生而言是“选”或“不选”。真正消除“酱油课”,不仅是加强教学管理与监督,更重要的是转变教育教学理念,突破传统的以学术为中心的价值观,明确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事实上,大学不仅应该尽最大可能把专业知识系统传授给学生,更要引导学生自我认识,了解社会,明确社会责任,懂得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发展。这才是对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最好的诠释。真正给予学生自我选择的机会与空间,去构筑自我发展的阶梯,谁还能只是走过、路过、看过,做个人命运的看客呢?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员)

大学要无条件追求知识与真理

■刘铁芳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的世界之中,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知识并不一定是知识本身,而往往是经过了诸种改造变形的知识。知识怎么被改造的?知识怎么进入个体?我们如何看到真正的知识,真正分享人类的知识?知识与真理不会必然地呈现在每个人的精神生活之中,而往往会打上各种意识形态的烙印。这其中,有政治意识形态,也有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利益至上的时候,利益本身就是一种主宰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于我们演进的遮蔽同样厉害。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要回到亚里士多德讲的求知是生活的本性,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条件地追求知识与真理。

为什么要“追求知识与真理”?首先知识与真理不会自动显现,必须要靠人自身去求得,对每一代人和每个人而言,追求知识与真理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过程。任何一代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简单地重

复前人的知识与真理,而必须把自己还原到追求知识与真理的过程中,保持知识对个体生命的开放性,凭借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敞开自我的心智。

其次,为什么要“无条件”地追求知识与真理?因为一旦是有条件的,真理就会降格,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就会成为工具。知识如果被异化,就会成为权利与权威的“帮凶”。一旦让自己脱离追求知识的过程,而成为知识与真理的代言人,那么,知识与真理将不再保持自身的开放性,个体也不再通过对知识的追求来获得心智的卓越,而也是为了扩展自己在世俗生活的权利与力量,从而赢得世俗的利益。当然这个利益有可能是个人的,也有可能是小群体的。

承认大学要无条件地追求知识时候,其实就是要承认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也就是不管外在环境如何,都要保持对知识与真理的无条件追求,保持心灵

对世俗的超脱,保持精神生活和精神生命的独立性。陈寅恪在王国维的挽词中写到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实际上是表明了作为一种大学人的姿态,也就是以自由之思想来成就独立之精神。独立之精神是自由之思想的目标,反过来,独立之精神又成为自由之思想的条件。唯有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才能促进心智的昌明和精神的发展,扩展民族的心智空间。而一旦失去了学问之于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就会掩盖在对功名与利禄的追逐之中,我们可能会获得物质世界的昌明,但我们的心智空间会被极大地遮蔽,这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长远发展就失去了内在的引导性。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保卫大学,保卫大学的学术独立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保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科研投入大国何以成为科研创新大国

■熊丙奇

关键。如果在增加投入的同时,不重视科研体制改革,投入很可能加剧科研行政化,不利于提高科研创新能力。

也许有人会不同意这一看法,并拿出一系列数据来说明科研投入,提高了我国的科研创新能力。比如,日前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十年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科技论文114.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比上年度统计时增加了11.8%。其中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用论文9524篇,比上年度统计时增加20.3%,排在世界第4位。此前,就曾有有关部门的领导,拿论文数量评价我国的科研实力。

但论文,甚至论文的引用率,都无法代表一个国家真实的科研创新能力。因为我国的论文数量是大中小学、科研机构甚至企业,对职工晋升职称、考核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为了晋升、考核通过,大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炮制论文,整个社会存在严重的“论文情结”。至于引用率,这是近年来学术评价中比较看重的指标——此前我国论文的引用率极低,很多论文是“零引用”,被称为垃圾论文——但再追问引用率从何而来,就很难高兴得起来:一些机构、学者为提高引用率,鼓励同事间互引,还发动国际同行帮忙引用。一句话,在我国,没有搞不定的数字指标。

这就是科研行政化的结果,学术研究急功近利。这还不算最严重的,总体而言,我国学术资源的配置,行政部门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由行政部门(或者有很强行政色彩的机构)设立课题(项目),接受学者的申请,这也是目前学术资源配置的主要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中,学术管理变为行政管理,学术评价被行政评价全面替代,于是出现课题申报、成果评定的“跑要”,公关现象,不论是学术机构,还是研究者,都“重立项、轻研究”,花很多时间搞课题,课题到手就意味着资源到手、荣誉到手,却不重视具体的研究,所谓的研究成果,有不少是包装、炮制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投入的增多,很有可能意味着

科研行政化加剧。政府部门手中掌握着大笔经费,各机构、学者要获得经费,就必须听从于行政部门,如此一来,学术研究的权力寻租空间增大,而权力和利益相互纠缠,必然败坏学术风气。近年来,学术腐败、学术不端事件高发。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就曾针对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系统腐败案及广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被查处等事件回应称,在这一领域出了这么多事情,肯定与制度有关系,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于科技研发的,60%都用于开会、出差等。如此推算,全国万亿科研经费,就用6000亿用于开会、出差,而国家财政投入的5000多亿,也有3000多亿没有真正用到科研之中,这样的科研投入体系不是投入越多,挥霍越大吗?

我不是反对增加科研投入,而是希望每一笔科研投入都用到学术研究的刀刃上。这就需要改革我国的科研管理体制,推进科研去行政化。具体而言,必须建立学术共同体,实行基于学术本位的管理和评价。在科研发展规划中,变政府主导创新为企业、市场推动创新;在科研立项时,应让科研基金具有独立性,不受行政支配,把项目给有能力进行研究的学者,而不是看申请者的名头、身份(是否校长、是否院士,是否有显赫的学术头衔者?国内有些重大课题,甚至不进行评审,就内定给某位“学术大腕”);取消学术课题提成,实行年薪制,堵住科研经费黑洞,遏制把申请课题变为致富之路;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公开经费信息;对学术研究的成果实行学术评价,重视成果的原创价值,不论论文、专利的多少论英雄,而关注真实的学术价值——我国每年取得的科研成果,有超90%束之高阁,每年诞生的专利真能转化的不到10%。

总之,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必须增加科研投入与改革科研体制两手抓,事实上,增加科研投入,正是启动科研体制改革的契机,如果忽视科研体制改革,科研投入极有可能成为“唐僧肉”,那将不是科技、学术界之幸。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大学生该如何成长

■郭英剑



前不久,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信息。说一位父亲阻止考上大学的女儿上大学。这位父亲算了一笔账:读4年书花8万元,如果打工至少挣8万元,捡垃圾都比读书强。像这样的“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社会上蔓延,且愈演愈烈,却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统计,2012年,美国具有本科学位的全职工人的每周薪水,要比只要高中毕业证书的工人高出414美元,每个月要多出1600多美元。而且,有本科学位的人的受雇率,也是高中毕业生的两倍。这样的例子,同样适用于中国。因此,读大学,无疑是人生的一个正确选择。当然,现在更大的问题是,应该好好去思考,该如何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

在哈佛大学南面对着的麻省大道上,有一扇门叫戴克斯特大门。门上有两句令我难忘的话,这两句话是由当时的哈佛校长,也是哈佛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艾略特所题。其中一句话写在大门的外面:“踏入此门,增长智慧。”

一所大学是学生可以学着增长智慧、培育信心和成为与众不同之人的地方。这与哈佛的信条一脉相承。这句话,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代表了我对“大学生该如何在大学成长”的理解。

我的想法是,作为一名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学习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增长智慧。当然,智慧不是小聪明,也不仅仅是聪明。智慧是一种眼光、一种境界,她既指导也主导着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和视角去看待世界,并教会你去努力地读懂人生。成为智慧之人,可能是一个人一辈子所追求的梦想与境界,但这个梦想与境界也应该从大学开始。

在我看来,所有被称为“语言文学”的专业,或者与之相关联的专业,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阅读。换句话说,“语言文学”的专业与读书有关。甚至可以说,这一专业就是读书的专业。

在当今世界,由于技术时代的极度发达所造成的人们过分关注新知识却缺乏深度思考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正因为如此,看书与思考,即便在技术发达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依旧是人们获取知识真谛的最重要的途径。

读书与思考,正如飞机的两翼,仅有一个,难以起飞,起飞了也难以维持平衡,无法持久。中国的先贤孔子说过: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一个人一味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不会有主见,所付出的劳动就白费了;而如果一味空想却不去钻研,则不仅一无所得,还可能很危险。换句话说,只有把阅读与思考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真知。

在我看来,如果说过去的问题是:学而不思,即喜欢看书,但不喜欢思考,盲目接受一切知识以及相关信息的现象比较严重的话;那么,在学生中,思而不学同样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国百岁学者杨绛曾经在给一位中学生的回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请注意,这个中学生是在向她请教自己人生的困惑。由此可见,在杨绛看来,这个学生的问题其实通过看书,是可以获得解决的。对此,我持相同的看法。许多人生的烦恼与问题,通过看书,继而思考,至少可以找到多种解决问题的答案,或者至少会对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有所帮助。

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基础教育管理得过于严厉,等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正需要着重提高学生智力水平的时候,对其要求却相对地要松懈得多了。我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基础阶段特别是小学与初中阶段节奏轻松,高中阶段加大力度,到了大学阶段,才真正是青年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的大好时期。

再举哈佛一例。哈佛有将近100座图书馆,但其中有一个专门针对本科生的图书馆,叫Lamont Library。这个图书馆是哈佛唯一一个每周5天均24小时开门的图书馆。因此,晚上无论多晚,看到有人从这个图书馆走出来,都不必觉得奇怪。由此,还产生了一个词汇,叫Lamonster。monster是魔鬼的意思,而Lamonster,就是指天天在Lamont图书馆学习,甚至经常半夜才从图书馆出来,像魔鬼一般的学生。

我想说的是,像哈佛大学这样顶尖高校的大学生,还在如此认真甚至拼命地学习。作为中国的大学生,自己应该如何去度过大学生活,确实值得好好地思考。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